

# 孙科责任内阁与国民党派系权力之争

张 皓

孙科,字哲生,孙中山的唯一嗣子,国民政府内核心人物之一,历任广州市长、铁道部长、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等要职。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根据宁粤之争的结果,决定推行行政院负实际行政责任的“责任内阁”制,首先出长责任内阁的即是孙科。但是,孙科就任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去职。孙科的就职与去职,生动而真实地展现出一幅国民党派系官僚斗争的情景画面。

## 一、责任内阁制的确立与孙科上台

孙科在担任行政院长时曾解释由他出任的原因有二,其一,由于国民党内三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一时不能来,不能不暂时找一两个人过渡”,其二,由他来作为“建筑材料中的土敏土”,求得蒋、汪、胡三人的团结。<sup>[1]</sup>那么是不是孙科所说的这样呢?其实,责任内阁制的确立和孙科出长行政院,正是他在宁粤和谈中的结果。这从下面的步步分析中可以看出。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胡赶走汪精卫,联合执政;孙科此时是政治上倾向胡汉民的胡派重要成员。1931年2月,蒋胡联合执政因约法之争而破裂,胡汉民的被囚禁,导致粤派人物迅速聚集在时任铁道部长孙科的旗帜下,孙科的政治影响迅速上升。3月上旬,孙科召集马超俊、梁启超、王昆仑、钟天心、陈创如、麦朝枢、周一志7人秘密开会,讨论如何反蒋,决定王昆仑先去上海,钟天心回广州,麦朝枢、周一志去沈阳拉吴铁城劝张学良反蒋,并到天津找西山会议派邹鲁、覃振、傅汝霖一同反蒋。同时,孙科拒绝蒋介石的利诱,由宁转沪到粤,并拉走南京空军多架习机。可见,孙科“一跃而为时局中心人物,政治上抬高了身份,完全是扣胡之后形势造成的”,<sup>[2]</sup>孙科派——再造派也在此时形成,孙科拥有争夺更大权利的政治基础。

对孙科有利的时机很快就来到。就在胡派、汪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广州国民政府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宁粤双方都声称“精诚团结”以对外。蒋介石致信孙科、汪精卫等人,宣称愿意承

担“过去之是非曲直”,但愿“诸同志以党国为重”,“各自反省相见以诚”。<sup>[3]</sup>被蒋释放到上海的胡汉民也电孙科等人,“甚盼公等推举代表来沪,进行和议,共商大计”。<sup>[4]</sup>这样,孙科认为利用困难夺取更大权力的机会已经来到,于是同支持他的重要人物李文范、陈友仁、伍朝枢与汪精卫从粤到沪,开始推行广州10月21日通电中所提“蒋下野、粤国府取消,由统一会议产生统一政府”。<sup>[5]</sup>的主张。

要夺取更大权力,就必须逼蒋下野,孙科在上海的住宅成为讨价还价的场所。和谈一开始,孙科就明确宣称“此来系代表粤府,须照预定程序,议有端倪始可入京”,<sup>[6]</sup>亦即宁方必须满足其条件。随后,孙科提出了如何才能称为“端倪”的《中央政制改革案办法》,其核心是实行责任内阁制,由行政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国民政府主席虽为国家元首,但不负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国家之总统;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四院长对于国家不与行政院长连带负责。孙科惟恐众人不明他的要求,便在附则中对他提案用意何在作了毫不相让的说明:“(一)主席人选以年高德劭而望重者为宜;(二)行政院长以精明强干而能整饬庶政者为宜;(三)外交部长以有革命历史能实行革命外交者为宜;(四)财政部长以富有理财经验学识者为宜,不限党员。”<sup>[7]</sup>这几条明显在于安排孙科自己及支持他的陈友仁、黄汉梁为目的。那么怎么安排蒋介石呢?孙科在粤方代表共同声明中回答说:既然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行政责任,又须“年高德劭”者来担任,而且蒋“素以努力国民革命自任”,故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较为适当。

蒋介石对孙科的这一提案极为愤怒,指责“此案与团结对外之主旨不合”。<sup>[8]</sup>11月1日,南京某国民党中央委员发表谈话,明确指出孙科的提案是针对蒋介石而提的,搏击所谓“年高德劭、精明强干、革命外交、理财经验者”,“似乎因夹袋中俯拾即是,故随便涉及”。<sup>[9]</sup>支持蒋介石的老右派张继的抨击更为猛烈,声称孙科既然是孙中山之子,就应对其父言行多“体会”,而不能感情用事。<sup>[10]</sup>

然而孙科置此抨击不理,不达目的不罢休。他在11

月6日进一步提出行政院长的职权要扩大,行政院长必须兼任应该设立的全国财政委员会主席,有权整理财政、审核预算、审核公债发行、稽核报销、公布收支帐目等。他还提出:“为防止国内战争起见,中央及地方之财政收入,如提供军费,应以国防及剿匪为限,财政委员会得拒绝关于内战之一切担负。”<sup>[11]</sup>孙科此举明显在于夺取财政大权,并防止蒋介石筹集发动消灭异己的内战经费。面对孙科的步步紧逼,尤其是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蒋介石只好采取以退为进、视情形发展相机对付的策略,于是上海和谈11月7日决定宁粤双方本着“合作精神”,各于南京、广州期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各自中央委员,然后统一召开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国民政府。孙科对此结果表示满意,认为利用形势逼迫蒋介石让步的目的已达到,于是兴高采烈带着李文范、陈友仁、伍朝枢于11月10日回广州通报情况,取得两广的同意。

孙科回粤之行并不顺利。他知道,如果得到汪精卫的支持,出长行政院就会顺利得多,因此在上海和谈中赞成了汪精卫所提融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委员为四届中央委员的建议,也就是赞成汪派成员在一、二届中当选而为三届铲除的中央委员,无条件成为四届的组成部分。然而汪精卫的条件遭到了胡派重要成员、老右派邓泽如、萧佛成在粤方四全大会的坚决反对。孙科对此极为生气,11月24日带着已派成员愤怒离粤到港,指责邓、萧等人的反对“毫不合理”,强调“一二三届之中央干部重新结合,为党开新生命之路”。<sup>[12]</sup>经过胡汉民的调停,粤方四全大会得以在吵闹中续开,但是汪派成员退出广州到上海,另行召开仅在选举汪派中央委员的上海四全大会。孙科争取汪派支持或不与自己为难的目的也就未能达到,这就为后来掌权增加了为难因素。

即使如此,孙科决心单凭粤方的支持,改组国民政府。在接到蔡元培、李石曾12月7日代表宁方电促北上召开四届一中全会“以解决一切党政军问题”的来电后,孙科次日就带着李文范、陈友仁、伍朝枢北上。12月12日,包括孙科派在内的胡派成员踢开汪派,开会讨论新政府人选问题,宣称蒋介石不下野就不入宁。蒋介石见此,在安排妥当后,于16日正式下野。孙科见目的已达到,次日带着自己人马入宁,高兴地对外声称:“余等此次入京,唯一任务在筹备召集四届一中全会,以实现上海和会之各种决议。”<sup>[13]</sup>也就是说,实现由行政院长负实行责任、由他来当行政院长的条件。

但是,孙科入宁掌权并不顺利。国民党元老,时任南京市长的石瑛公开反对:“孙科是总理不肖之子,其为人好色好货,且不负责,怎能担任非常时期的大

事?”<sup>[14]</sup>汪精卫此时决心同蒋介石联合制时,拒绝入宁支持孙科,声称自己不但有肝病,且有糖尿病,胆囊又发炎,如果勉强入宁,“将永无恢复健康之望”。<sup>[15]</sup>见此,孙科“政躬失调”了,以致12月22日重要的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也未出席,并于25日赴沪“以资休养”。虽然如此,孙科并不罢休。他派人在全会上宣读其“痛切陈词”,声称如果想要国民党“负起其救国之使命”,只有大家“恪守‘大会’与‘至诚’之精神”,“为党再造一新的生命”。怎样才能创造“新生命”呢?孙科的答案是要各派“混除派别,精诚团结,同心协力,为党牺牲”。<sup>[16]</sup>这一演说公开暴露了各派在新政府人选问题上的争执,在全会上引起轰动。蒋派见此赶忙开会讨论,结果“益以吾方愈少加入愈佳,不与计较”。<sup>[17]</sup>于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全会上解释说:孙科赴沪属“寻常事件”,现在全会进行“顺利”,“全体委员均集中意见,以应付国难”,孙科个人“不日即返京”。<sup>[18]</sup>这样,四届一中全会终于修正通过了孙科提出的推行责任内阁制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据此,被蒋作宾讥为几为广东派霸占权位的孙科政府1932年1月1日正式成立,孙科任行政院长,陈友仁长外交,李文范长内政,黄汉梁署财政。时人后来称这次行政院从蒋介石向孙科的过渡,视为“中国的两个经济势力——江浙帮和广东派的斗争”。<sup>[19]</sup>

孙科对其斗争结果表示满意,在就职演说中声称他是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来出长行政院的,并指出“我们要晓得这次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正和国民政府的改组,是经过很大的牺牲、全国人民的牺牲,才换到的”,因而“只有忠实的照所修正的这个方法去做,才能走上真正的民治之路。”<sup>[20]</sup>

## 二、制肘与反制肘

前述表明,责任内阁制的确立与孙科出长行政院,是他在派系权力之争的结果,孙科本意并不在于过渡,但是随之而来的派系斗争使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了。孙科上台伊始,就遭到了蒋介石加上汪精卫如下制肘:

其一,利用中政会来牵制。根据国民党“训政”体制的规定,国民党中央通过中政会即中央政治会议将大政方针交给国民政府执行,中政会是党政间的枢纽,如果政策未经中政会批准,国民政府是不能推行的。虽然四届一中全会为适应三巨头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团结”的需要,将由蒋担任主席的中政会主席制改为由蒋、汪、胡三人任常委的常委制,然而蒋仍然可以利用中政会来牵制孙科政府,亦就是拒绝入宁,使中政会无法开会而停止运转,行政院当然无从秉承。孙科对此非常愤怒,他在回答行政院为何还未公布大政方针时指出:行政院并不完全等同外国之责任内阁,因为它不

能单独决定大政方针,必要中政会议定之后,才可去执行。而汪精卫虽“决于最短期内来京,但医生嘱其须留沪,多打几针,庶病易于告痊”;胡汉民“在港患病”,虽经电促,却“迄今仍未决定晋京日期”,蒋“何时来京,亦未确定”。孙科无可奈何承认:“行政上的责任虽由行政院长来负”,但是“目前的关键就是在政治会议的首脑,要使他们能一齐入京,才可以减少困难”。<sup>[21]</sup>

其二,在让中政会停止运转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外交来制肘。“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采取的外交政策是“希望国联主持公道,制止暴日行动”。在全国人民要求全力抵抗、对日作战的呼声面前,孙科对这一政策是反对的,努力想改变这一依赖国联的政策,推行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宣战的政策。孙科在1931年12月7日入宁时即宣布:“统一政府成立后,同人等相信必能尊重民意,与人民同心合力,发挥革命外交之精神,运用革命外交之策略,以恢复东三省之领土主权。至不得已时,同人等相信政府亦必下最大之决心,决不致有负国民之期望也”。<sup>[22]</sup>但是作为责任内阁总理的孙科却“没有权去解决”,只能“候政治会议有所决议,然后才能依照决议去执行”。<sup>[23]</sup>在蒋介石玩需手段使对日绝交宣战政策得不到贯彻的情况下,孙科被迫致电蒋汪,称“溯自受事至今,已将一月,而最重要之外交方针迄未能有所决定,该部长亦以贡献之对日政策未蒙中央诸同志采纳,今已提出辞职”。<sup>[24]</sup>

其三,财政上卡住孙科政府的咽喉。宋子文去职财长时,就按蒋介石的吩咐作了安排。新任财长黄汉梁接收国库时,不仅未得分文,而且宋子文还拖欠了银行界1000万。各地也截留税收;广东自扣留税收后,旧扣未还,新税仍继续扣留;自东北失陷后,东北军经费完全取之于华北,且每月不敷甚巨;湖北何成 截用江汉关税;山东韩复榘截用关税,福建地方截用统税。这些情况使得孙科政府的财政困难“为世界各国所未有”。孙科虽然将财政支出从蒋介石任行政院长时每月3000多万压减至2200万,但是每月收入仅600万,每月不敷达1600万。<sup>[25]</sup>孙科公开批评蒋介石的财政制肘,强调“国家财政困难至此,实影响到外交军事种种”,声称他自己在国难日亟的情况下不能卸责,但是蒋介石的制肘,使有责不能负。<sup>[26]</sup>

上述制肘使孙科政府几乎陷于瘫痪,正如时人后来描述说“所谓孙科政府这时困守南京,真是一筹莫展。”“各省的政府各人干各人的,简直不买南京的帐,上海的经济势力更是直接同孙科为难,弄得孙科政府的政令不能走出南京一步,孙科进退无筹,徨在上海。”<sup>[27]</sup>

卫的制肘,在就职时表示决心“忍受着一切痛苦”,“勇往直前”去“斩开重重荆棘”,依靠民众的力量打破“武力支配一切的局面”。<sup>[28]</sup>针对上述制肘,孙科相应地进行了反制肘。

其一,设立中政会特种委员会,使中政会不能因常委蒋汪胡不在南京而停止运转。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向孙科建议说:“万一三领袖不来,或迟迟其来,重心不立,政府不固,我们也不能等死。”<sup>[29]</sup>1932年1月12日,孙科在上海家中召集陈铭枢及反蒋的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邹鲁、马超俊等人开会,讨论成立特委会。孙科指出:由于“政府目前困难,外交紧急,中枢负责无人,应该设法充分力量”。<sup>[30]</sup>于是决定成立特委会,“以应国难及迅速处理各项政务,专负其责任”。<sup>[31]</sup>除蒋汪胡为当然委员外,推孙科、居正、张继、张静江、何应钦、于右任、朱培德、陈铭枢、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陈友仁为委员。随之,孙科等人一同返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议通过这一决定,使之法律化。这样,孙科有了较能自由处理政务的可能。

其二,在外交上,孙科由于不能推行对日绝交抵抗的政策,只好继续执行蒋介石已定的外交政策。1月18日,他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作《打开财政外交困难的途径》演说中说,政府要求国联各会员国“主持公道,以经济的力量制裁日本横暴的行为”;接受美国关于“不承认东三省因军事行动所造成事实的状态,及因此次事变而造成有侵害美国在东三省权利的条约”的通牒,并希望美国召开第二次华盛顿会议求解决东北问题,关于对日直接交涉,声明日本在东北的行动一天不停止,中国一天不直接交涉。<sup>[32]</sup>很明显,孙科被迫继续执行这一政策的原因,不过在于减少蒋派的压力。但是,孙科对此并不甘心,一方面如前如述宣布他不能推行自己政策的原因在于蒋的制肘,一方面支持陈友仁1月24日在上海发表谈话,抨击蒋关于东北政策原是一贯主张消极不抵抗政策的反映,这种政策“以致锦州失陷,而中国军队且全部撤退于关内,外交问题乃是愈陷于困难”,并进一步警告国人,“蒋氏这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对于全国人民为日人暴行引起之抗日救国运动加以武力之压迫”,因此,“对日绝交之事,实为必要而不可避免之方法”。<sup>[33]</sup>从而将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实质及其恶果向全国公布出来。

其三,财政上开源节流。孙科在上台前即决定:“开源方面,则以举办合法之税收,以无害于民,有利于国为目的;节流方面,则以裁减机关,缩减军政各费为原则。”<sup>[34]</sup>上台后,孙科将缩小财政部职权,成立财政委员会并扩大其权力的计划付诸实施,规定“今后在行政

应该说,孙科在上台前就预料到蒋介石加上汪精

系统上虽然还仍旧有财政部,但是财政的决定权已移在财政委员会身上”。<sup>[35]</sup>孙科以行政院长身份兼任财政委的主席。之后,孙科通过该机构将开源节流的计划付诸实施:军费从每月1800万缩减至1600万,政费400万缩减至200万;“决议中央各机关自本月(1932年1月)起在最近半年内,每月经费减发五成,同时裁撤骈指机关以节浮费”。虽然如此,每月“不足之数仍在1000万以上”。<sup>[36]</sup>于是,孙科又在开源方面打算并为了对付银行界的为难,采纳冯玉祥、李宗仁、覃振等人的建议,以非常手段“把关税、盐税、统税的拨付公债基金部分,由政府议决收回,公债停付本息,如此政府可过好日子,而银行界十之八九必关门”。<sup>[37]</sup>此外,孙科在财长黄汉梁被银行界吓辞职时,以军人陈铭樞兼财长。这样一来,银行界既担心失去财源,又害怕开军人出长财政的“恶例”,表示“愿意同政府合作,并欢迎黄部长复职”,决定由上海银行界与证券交易所共同负担900万。这加上中央政府月收入可达1600万。孙科相信,虽然远差200万,但“若再裁减一些军政费,也尽可维持”。<sup>[38]</sup>

从上述看出,蒋介石的制肘是有限的,这并不在于蒋没有能力做到,而在于如果完全使孙科政府陷于瘫痪,是不利于国民党的整体利益。因此,孙科得以顺利地成立中政会特委会,并通过采取了系列开源节流的措施,银行界也最终给予有限支持。一旦孙科试图动摇蒋介石的统治基础,如在特委会上提出三条反蒋措施,即外交上对日绝交、财政上停付内外公债本息、内政上罢免长江几省主席如江西熊式辉、湖北何成等人的职务,也就行不通了。这表明,孙科的反制肘措施得以施行,也仅仅是蒋介石所允许的维持政府机构必要运作的必要措施。

### 三、孙科在乞求支持的奔波中下台

正是由于孙科派的势力还较弱,动摇不了蒋介石的统治基础,孙科实现不了独自掌权的雄心壮志,在第一次出长行政院的短短25天里三次提出辞职,并奔波于南京、上海、杭州间,乞求蒋介石、汪精卫的支持与合作。正是在这来往奔波中下了台,一旦蒋汪达成踢开胡汉民、孙科而联合分赃的协议,孙科政府的命运就到了尽头。

孙科政府成立的次日即1932年1月2日,中政会紧急会议就决定由林森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孙科以行政院长名义电请蒋介石重返南京“共商大计”。会后孙科即电蒋说,由于蒋汪胡“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导致“国事不易收拾”,称蒋“平昔爱国爱党,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因而“务望莅京坐镇”,使“中枢有

主,人心自安”。<sup>[39]</sup>林森电胡说:“哲生为总理单传之子,素为公所爱护者,今既然不避艰险,肯牺牲一切,公而忘私,我辈深嘉其志,尤表同情,似不忍袖手旁观,任其焦头烂额,而不加以援助。”<sup>[40]</sup>可见孙科的乞求非常“诚恳”。

孙科不仅电请支持,还亲自奔波敦请。他在上台的次日即到上海访汪“晤谈一切”。汪此时还未完全同蒋介石勾结,故而接见了孙科。一旦蒋汪协议达成,孙科不但连蒋见不到,就是汪也见不到了。1932年1月9日,孙科第二次从宁到沪自驾时,汪精卫避而不见,汪妻陈璧君声称:“医嘱静养,屏绝思虑,则70日后方可告痊。”<sup>[41]</sup>可见汪的“病”的确很重。然而“病”重的汪却能乘火车到杭州同蒋勾结。孙科想见蒋时,却不知蒋之踪迹,蒋兄蒋锡候明确告诉孙科不要到奉化来,因为蒋已赴雁荡山;张继则对孙科说,蒋在何处,只有到杭州去才知。这样一来,孙科的希望完全落空了,只有辞职。

1月16日,蒋汪在杭州达成勾结协议后即联电孙科,谎称他们候胡汉民北来后即“联袂入京”,“竭其心力协助,与兄支持危局”,<sup>[42]</sup>并要孙科电胡速驾。可是孙科1月18日乘蒋派来的飞机到杭州同蒋汪等人召开“烟霞洞会议”时,却被迫接受了孙科政府倒台的定论。不仅如此,孙科1月21日在上海违心地发表谈话,称他“赴杭结果甚为圆满”,因为“蒋汪两先生对目前难局,尤能表示团结一致,共同负责”,“从此中枢充实,困难之局可望有转机”。<sup>[43]</sup>

然而即使是违心谈话,也遭到了蒋介石的一记耳光,蒋明确声称:“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灭亡,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sup>[44]</sup>在这里蒋明确说他入宁是帮助不负实际责任的虚位元首林森,而不是内阁总理的孙科。因此特委会1月24日正式否决陈友仁再次提出的对日绝交宣战政策。在这记耳光下,孙科气愤万分,与陈友仁辞职赴沪后也赴沪,“电呈中央求去”:“行政院长,非有大力,莫克负荷。而自顾轻微,才力俱绌,虽于解救时艰欲尽其一得之愚,然形格势禁,徒成废论,焦头烂额,于事何补。窃念过渡之责已完,覆之虞为戒,何可继续适延,自误误国,用是披沥忱悃,签恳准予即日辞去行政院长一职,另选贤能,免误国事。”<sup>[45]</sup>经过一悉假意的挽留后,1月28日蒋主持召开中常会会议,正式决定:(一)行政院长孙科辞职照准,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二)立法院长张继辞职照准,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孙科未到职以前,由覃振代理。

有趣的是,孙科去、汪精卫来的权力交替、派系斗争的实质原因被政见分歧掩盖了。冯玉祥当时就描述

说：“在我的看法，孙出去的原因，纯系同蒋意见不同。蒋则对外不战，对内用武力统一，汪则不能独立，……处处以蒋之意旨为意旨……，胡则坚持打倒独裁，并分化蒋之实力，同时主张惩张（学良），孙之意见近于胡，且谋独树一帜。”<sup>[46]</sup>冯玉祥固然指出了相互之间的政见分歧，孙科也曾在1月27日声称“中外对外方针与彼不同，行政院长职务重大，彼不克负荷，辞职全系为党国，决非人的问题”，<sup>[47]</sup>但是，蒋作宾一针见血指出实质：“汪实有取得政权，孙窥其意，故愤而辞职。”<sup>[48]</sup>

综上所述，至少可以看出两点结论：

其一，孙科所提出的《中央政制改革方案》，核心是设立责任内阁制，目的是“想用来制裁蒋介石独裁”。<sup>[49]</sup>这一情况显然同西方政党的政治和议会政治下的责任内阁制显然不同，当然不可期望国民党一党专政下强行移植的责任内阁制推行顺利，行政院虽负行政责任而无决定政策之权，从而演出一幕幕制肘与反制肘、乞求支持的悲喜剧，难怪时人指出：“夫党治民治，各有范畴，今截取内阁制一段精神，而硬与党治制度相拼凑，意义全非，效用尽失。”<sup>[50]</sup>

其二，国民政府政治制度改变的根源是派系权力斗争。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各派尔虞我诈，翻云覆雨，孙科也坦白地承认“党内有派，为不可掩之事实”。<sup>[51]</sup>胡汉民也承认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人每欲自私，则互相排他，排他则纠纷愈多”，<sup>[52]</sup>汪精卫当时未上台，是因为顾孟余建议他“不宜在反蒋的局面下上台，不如稍候时机在蒋汪合作的形势下上台”；<sup>[53]</sup>孙科上台是由于两广支持，“孙是粤方提出来的，不答应不行。”<sup>[54]</sup>孙科下台，固然是由于蒋汪勾结联合拱下台，但也是由于孙科的势力太弱，广东方面也不真心实意支持，反而“设立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军务委员会，并截留税收，实无异变相之独立，此皆足以致孙哲生之死命者”<sup>[55]</sup>如果广东全力支持孙科，出现的或许不是蒋汪而是蒋孙联合了。

45期。

[12]《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8卷第47期。

[13]南京《中央日报》1931年12月18日。

[14][24][33][37][38][40][54]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72 79 95 75 70 73页。

[15]南京《中央日报》1931年12月21日。

[16]南京《中央日报》1931年12月23日。

[17][53]《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10 820页。

[18][34]南京《中央日报》1931年12月27日。

[19][27]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时期我的内幕活动》，《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3页。

[20]孙科：《新年的新希望》（孙哲生先生言论集），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17—118页。

[21][23][25][35]南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6日。

[22]腾霞：《蒋介石辞国府主席》，《国闻周报》第8卷第50期。

[26][30][31]南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13日。

[28]南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1日。

[29][41]南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12日。

[32][36]南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19日。

[39 44]木吉雨等编译：《蒋介石秘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48 348 349页。

[42]南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18日。

[43]南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21日和22日。

[45]天津《大公报》1932年1月26日。

[46]《冯玉祥日记》（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69页。

[48]《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03页。

[47]南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28日。

[49]黄绍：《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80页。

[50]《一中会全通过中央政制案》，天津《大公报》1931年12月26日。

[51]《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9卷第17期。

[52]《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8卷第42期。

[张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博士 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孙秀民）

[1]天津《大公报》1932年1月9日。

[2][3]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6 93页。

[3][7][8]腾霞：《上海会议》，《国闻周报》第8卷第44期。

[4][5][6]《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8卷第42期。

[9][10]南京《中央日报》1931年11月2日。

[11]《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8卷第